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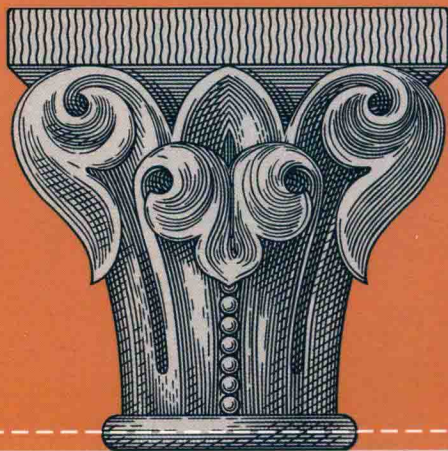


影响欧洲近代社会的 史诗性变革

— 旧制度与大革命 —

〔法〕托克维尔◎著 胡勇◎译

深度剖析制度与革命关系的经典之作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影响欧洲近代社会的 史诗性变革

—旧制度与大革命—

〔法〕托克维尔◎著 胡勇◎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响欧洲近代社会的史诗性变革：旧制度与大革命 /
(法) 托克维尔著；胡勇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8.8

ISBN 978-7-5581-5844-5

I. ①影… II. ①托… ②胡… III. ①欧洲—近代史
IV. ① K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1214 号

影响欧洲近代社会的史诗性变革：旧制度与大革命

-
- | | |
|------|---------------------|
| 著 者 | [法] 托克维尔 |
| 译 者 | 胡 勇 |
| 出 品 |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
| 策划编辑 | 周耿茜 |
| 责任编辑 | 王 平 史俊南 |
| 装帧设计 | 胡椒设计 |
|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
| 印 张 | 20 |
|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发 行 |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22
邮编：100052 |
| 电 话 |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
| 邮 箱 | beijingjiban@126.com |
| 印 刷 | 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
-

ISBN 978-7-5581-5844-5

定价：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曾担任众议院议员、外交部长等职，并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因反对称帝而被捕，获释后淡出政治舞台，从事历史研究，直至1859年病逝。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美国游记》等。

译者简介:

胡勇，河南舞阳人，政治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已有译著百万字出版，有托克维尔研究专著、译著及论文出版和发表。



策划编辑：周耿茜

责任编辑：王 平 史俊南

装帧设计：

投稿邮箱：dongfangwenhua66@sina.com

导读

《影响欧洲近代社会的史诗性变革：旧制度与大革命》（以下简称《旧制度与大革命》）同《民主在美国》（也被译为《论美国的民主》）是法国近代思想家与政治家托克维尔（1805—1859）最为著名的两部学术作品。该书既被视为一部历史作品，也越来越被视为一部社会政治哲学著作，在历史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等学科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将帕斯卡尔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托克维尔一生崇拜的偶像是法国大物理学家帕斯卡尔。他最倾心帕斯卡尔的是，帕斯卡尔毕生将无任何（个人）功利目的的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事业。他的人生观与人性观颇受帕斯卡尔的影响，在其作品中也多次引用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只有在贵族时代才会出现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基础理论研究，而在民主时代只会出现短平快的技术应用研究。从这里可以发现托克维尔对于贵族、贵族制与贵族时代的一种独特态度。

托克维尔出生于地道的贵族世家，其曾外祖父马尔泽布曾经是旧制度下典型的作为国王与人民之间调停人的旧贵族精英，因为曾为路易十六辩护在大革命时期被作为王党分子送上断头台，正统派作家《墓中回忆录》的作者夏多布里昂是其姻亲，其父是具有公共参与精神的“典型的贵族”，做过复辟时期的几任省长和贵族院的长老。但就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厚贵族传统的家庭中，有人成为狂热的雅各宾分子，有人成为百

日帝国的代议士，有人成为复辟的波旁王朝的效忠者，有人成为七月王朝的上层人物，还有人成为拿破仑的将军与朋友。这些人的政治立场不可能不对托克维尔有所触动。

托克维尔出生于拿破仑帝国统治之下，经历了两个君主政体和一个共和国，死于拿破仑侄儿的帝国之中。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近代动荡多难的法国政治命运的象征。他做过复辟时期的助理法官；担任了近十年七月王朝众议院议员；支持与参加了议会的各种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他被选入第二共和国的立宪议会，并参加了制宪委员会的制宪工作；随后进入立法议会，并担任副议长；六月起义中首次同“多数”站在一起，亲自走上街头镇压了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诉求；他在波拿巴总统领导的巴罗内阁中担任了5个月的外交部长；最终在1851年的雾月政变中被逮捕，随后完全退出公共生活，成为“国内流亡者”；在随后的岁月中多次拒绝波拿巴邀其入阁的请求，完全潜心于精神世界中，直至1859年病逝于戛纳。

托克维尔出生于历史悠久的贵族家庭，成长于贵族文化之中。托克维尔私下承认：“在理智上我倾向于民主制度，然而本能上我却是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与惧怕大众。我满怀感情地热爱自由、法制、对权利的尊重，然而却不是民主。这就是内心的实质。”在托克维尔的精神世界中不但存在着理智与本能的对立，还存在着理性与感情的冲突。有人称他为：“理智上的民主分子，心灵中的贵族。”然而，托克维尔的贵族情调并未阻碍其最终的独特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而是给予了它一个独特的跨时代、跨文化的反思视角；托克维尔精神世界的内在冲突并非不可妥协，也并未妨碍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念与事业——自由。他说，“自由是我的最重要的激情。这就是真理。”

正是托克维尔所处的特定时代与环境给予了他广阔的、多角度的与跨时代的、跨文化的观察与思考政治问题的视角，使得他能够“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保持彻底的平衡”，使得他对贵族与民主都不抱有特别的爱与恨，而他个性中的所有矛盾、分裂、张力最后都统一到一种他唯一的观点与激情上——即“对自由与人类尊严的热爱”。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核心关注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研究了大革命爆发的长期与近期原因，大革命独特面貌的形成原因——大革命为什么才会发生，大革命为什么会与众不同？但在这种研究的深处，这种研究的根本目的，他处心积虑的关注就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号的大革命，为什么走向了自由的对立面——专制，怎样才能在现代社会实现平等与自由的和谐统一。可以说，贯穿于托克维尔所有研究所有著作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平等化的时代实现自由。

在托克维尔的行文中，自由的含义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惟一统治下能够毫无束缚地交谈、行动和呼吸”。这种自由观可以分解为两层含义：个人自由与联合自由；前者是人身、安全、财产诸项涉及个人私生活领域的自由；后者即政治自由，即作为公民身份共同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政治权利的公共领域的自由。平等则经常和民主一词互用，表明一种以大众为主体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活。

在民主化时代，民主的前途既可以是“民主的自由”，也可以是“民主的暴政”。但是，虽然“人对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的爱好，实际上是两码不同的事情”，托克维尔并没有认为民主天然地对自由具有敌意，甚至认为民主内在的独立倾向还会激起人们对政治自由的爱好。自由与民主作为两种不连贯的善，不会必然地导致冲突与竞争。它们之间的敌意纯粹是历史性的，特别是源于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形式的发展。所以，政权形式的专制主义与组织形式的中央集权制的形成、表现以及破解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关注。

有关《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理论思考

下面主要从作者的写作方式、研究方法 with 主要观点这几个方面简要谈一下对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点理论思考。但需要明白的是，对于该书的理论思考应该是开放的，远远不止这几点。

一、作者的写作方式，也就是作者是如何表述自己的观点的、组织

自己观点的方法。主要谈及两点。

1. 悖论式表述：我们觉得是这样，实际上却是那样，结果和预料刚好相反。这种表述方式常常得出一些违反常理与常识的结论，所以很吸引人。这样的例子有：在封建制负担越最轻的地方，却是它越不能被人民忍受的地方，当地人民的革命性越强；“拒绝向国王履行义务的贵族是后来法国惟一拿起武器捍卫君主制的人们，其中一些人死于捍卫其利益的战斗中”，也就是说，最初反抗国王的贵族却最终成为支持国王的贵族；“法庭对于政府的非常规干涉，常常扰乱公共事务的有序处理，因此，有时有利于保护自由。这是一种弊端，却限制了一种更大的弊端”，也就是说，虽然是一种政治弊端，其效果却会医治另一种政治弊端；“谁寻求过度的自由与权利，谁就会得到过度的奴役”；最重要的悖论就是有名的托克维尔效应，我们会在下面谈及。作者在指出这种悖论后，然后再说明分析这种悖论的成因，最终，给读者以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2. 场景式呈现：对于深刻的社会政治现象以文学手法通过生动鲜活的场景呈现出来。作者曾经说：“我的目标是绘制一幅图像，它不仅极为精确，而且或许富有教益。”比如：在第5页他描绘了一副个人主义社会与专制主义政体相结合的图景，说明了个人主义往往为专制主义提供土壤与营养；在第37—38页他形象描绘了旧制度下法国农民所遭受的种种封建压迫，说明了残存的封建制度比完备的封建制度的压迫效果更要让人难以接受，所以，在封建迫害缓和的地方却容易激发革命；在87—88页他描绘了法国各个阶级与集团所陷入的一种集体个人主义情景，说明了旧制度下的法国的阶级分裂现实所导致的专制主义趋势；在第143—144页他描绘了人们针对自由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把自由作为一种工具手段，一种是把自由本身作为一种善，说明只有对于自由的真正之爱才能留住自由；第61页和174页形象地描绘了法国行政机关对于社会活力的压制和其生命力，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法国官僚制对于法国社会生活束缚的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的这种以文学手法表达学术观点的手法对于追求纯粹专业化的当代学术写作有一定的消解和借鉴价值。

二、研究方法。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使用的方法，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常用的主要有两种。

1. 比较方法，托克维尔被称作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方法之父，

不管是在《论美国的民主》还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都大量应用了比较方法。这种方法又可分为两种方式，即：纵向比较——中世纪与现时代的比较，比如，他经常在行文中将中世纪的制度与现时代的制度加以比较，说明制度演变的效应，经常将中世纪的贵族同旧制度下的贵族加以比较，说明贵族的地位、功能与身份意识的变迁；横向比较——大洋两岸三地的比较，他经常将英国、德意志诸邦（当时德国还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美国和法国的逐项制度与社会状况加以比较。比如，他在比较新英格兰的乡镇自治与旧制度下法国的乡镇制度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就像一个活的个体和一个它的尸体一样相近。”堪为精辟之谈。

2. 阶级分析方法。托克维尔说：“在这里我谈到的是阶级，它应该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惟一目标。”托克维尔很大程度上是从阶级冲突的角度解释大革命成因的。在他从对大革命预备阶段到大革命发生阶段的分析中，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强调了贵族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三角斗争。然而，不同于马克思，他强调的是主观的心理冲突而非客观的经济冲突。他认为，三个阶级之间的分裂与冲突才导致了大革命以及其后的专制主义。

三、主要观点。《旧制度与大革命》里的精彩观点数不胜数，我只是列举和现代社会特别相关的几点。

1. 自由与平等（在托克维尔的社会学分析中，常常将平等视为民主的同义语）的辩证关系。自由是托克维尔政治与理论生活的核心价值追求，而在民主时代如何维持自由，如何实现自由与民主的和谐是他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托克维尔认为：“本世纪首先是一个民主的世纪。……欧洲社会即刻的未来是完全的民主；这决不能被怀疑。”托克维尔并不厌恶民主，还有点推崇民主：“平等也许并不怎么崇高，但它却是非常正义的，它的正义性使它变得伟大和美丽。”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可以同专制相结合，也可以同自由相结合。民主的前途可以是“民主的自由”，也可以是“民主的暴政”。但是，在民主化、大众化时代，我们必须在尊重民主、利用民主的基础上维持自由。最终，民主是导致自由还是奴役，是导致文明还是野蛮，则完全依赖人类的自由选择与自由意志。托克维尔的高超预言其实在现代德国的政治进程中得到了体现：

希特勒以完全民主的程序建立起了他的独裁统治。当然，他的论断也是基于拿破仑通过当时欧洲最为民主的程序——全民普选而踢开共和政体建立起法兰西帝国，还有他的拙劣模仿者，其侄子——波拿巴。大众民主向专制主义蜕变的现象与症结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2. 现代社会的特征。托克维尔在考察旧制度下法国的社会特征时，描绘了两种不同的形象：当时法国的所有人都是相像的，都具有共同的爱好与追求，尤其是对物质福利的狂热；个人与团体都自我孤立起来，只关注和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抛弃了公共关注与利益。托克维尔认为，这两种趋势才是专制主义乐意看到和推动的。这其实就是社会学家所谓的现代社会的两大特征：个人主义与均质主义，或者原子化趋势与同质化趋势。当代学者在研究极权主义社会，经常会将这两种社会特征作为极权主义的催化剂，体现了托克维尔的这种卓越的社会学洞见。

3. 大革命的性质。托克维尔对于大革命性质的描述，使得大革命成为现代革命的序曲，或者现代革命的开端。他认为，大革命是在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抽象理论的指导下，以人类自身无限完善与改良为目标的，其传播范围超越具体国界的，以彻底改变政治制度、社会基础、文化观念乃至人本身为目标的一场革命，它具有宗教革命的热忱与献身特征，它使用了“武装的舆论”（即现代意识形态），致力于塑造一种新人类，而革命家也将作为这场革命中所出现的一种新的种族，从此以后在世界上生生不息。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描述，实际上界定了现代革命与革命家的面貌与性质，使我们不由得联想起大革命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革命风暴。

4. 法国行政机关的特性。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下的行政机关牢牢地控制着社会生活，扼杀一切创新源头，拒绝一切外来的渗透，拥有不变的逃脱政局变动的常规方法与精神，它行使着一种细微的、广泛的和绝对的权力。他说：“尽管每一场革命砍掉了行政机关的头颅，但其身体依然原封未动和生气勃勃。”只要行政机关继续存活下去，“一旦任何人试图推翻专制权力，他就只能把自由的头颅装在一个奴役的躯体上。”托克维尔对于法国行政机关的描述，其实指明了现代官僚制的封闭性、自适性、渗透性等特性，成为后世学者对官僚制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先声。比如，马克斯·韦伯将官僚制描绘为“理性的铁笼”，认为官僚制（也即

科层制)作为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产物,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在组织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具有高效性,另一方面造就了社会生活的常规化、刻板化,并扼杀了社会创新精神。显然,这种认识来自托克维尔。

5. 学术与政治的恰当关系。托克维尔在反思法国的文学政治的弊端时,赞赏英国人的学术与政治关系:“在英国,研究政府的那些人同统治国家的那些人融合在一起,所以,后者将新思想引入实践,而前者借助事实修正和删减理论。”一个领域负责政治生活的创新,一个领域负责政治生活的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创新与务实的统一,这是最合适的学界与政界的关系状态。

《旧制度与大革命》与当代中国的相关性

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和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状况,如大众觉醒、阶级对立、特权肆虐、权利意识高涨等社会现象似乎有些相似,通过对过去法国失败的改革、蜕变的革命的教训的反思,可以避免中国走入法国式的“专制——革命——专制”的恶性循环,走出一条社会与制度转型的中国式道路。法国大革命,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和当代中国相关性比较大的观点主要如下。

一、革命期望律(托克维尔效应)。也许《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当代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就是托克维尔所发明的一个赫赫有名的政治定律——革命期望率,或者被称为托克维尔效应(Tocqueville effect)。这个定律表明:革命发生在境况好转时,而不是发生在境况越来越坏时。托克维尔的原话是:“从坏到更坏,并不总是导致革命。最经常发生的事情倒是,一个民族可以忍受最具有压迫性的法律却毫无怨言,好像感觉不到它们,当负担减轻时却反对这些法律。一场革命所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就在它前面的政权更好,并且经验教会我们,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当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学者通常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生活境况的好转会激发人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但实际生活条件的提升速度远远赶不上人们的期望增长速度,当两者之间的差距过大的时候,对于现状的不满就会引发革命。

当前的中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物质福利、法律秩序、人

权保障，的确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许多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问题依然尖锐，人们对政府的批判越来越尖锐，对于政府的期待也越来越高。在这种社会形势下，托克维尔的教诲的确值得我们警醒和深思。

根据合法性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效益合法性之上。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具有固定的周期，这个周期很难打破，假如由于某种经济衰退，导致人民对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必然会危及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执政策略是，必须将自己效益合法性转化为程序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不断扩大与落实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以此逃脱革命期望率的魔咒。

二、对待革命的评价。我们对于革命的一向认识就是革命导师的教诲：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意思是说，革命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其实，恩格斯晚年也有条件地认为，可以将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作为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一种策略，而且革命导师也没有排除在某些国家（比如早期的美国）实现和平改良的可能性。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是一场全新的事件，它只不过继续和强化了旧制度的工作；大革命是在自由与平等的期望中发动的，但最终却走向了奴役中的平等；大革命破坏了所有旧制度，包括其制衡性力量，所以也带来了最绝对的最不受约束的权力。革命并不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万灵药。联想到我们中国，建国以来对待革命的态度其实经历了一种转换过程。现在，几乎所有社会精英都认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改革而不是革命，革命的破坏性、不可控性、副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国家，实在难以预料。许多学者也包括一些领导人都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真正转变，其实意味着对于革命态度的一种转换。

三、改革的策略。托克维尔在哀叹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法国进步的时候，却赞赏英国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他说，在英国，表面上中世纪的政体依然在发挥效力，但17世纪的英国就是一个充分现代化的国家了，“正是这些被逐渐地和巧妙地引入的革新，有可能更新旧的机体，而没有风险破坏其完整性，有可能给予它新的生命期，同时保留其古代的形式。”改革不见得是对原有体制全盘否定，可以通过点滴和逐步的步骤和措施，最终改变原有体制的内在精神与实质。对于中国当代

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持这种态度，不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重组，只要现有的机关能够充分全面地依据法律规定发挥其法定职能就可以了。

四、如何消解革命。托克维尔认为，正是法国的阶级分裂和阶级对立造成了人们面对革命时的无能为力和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厮杀，正是政治自由的缺乏造就了革命的诱惑力。只有政治自由才能让各阶级在共同的政治参与中联合起来，只有政治自由才能破除抽象的革命理论的影响，才能给予人们治国经验而非革命冲动。联系到中国，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如何破除几千年来的革命周期律时，谈到，只有实行真正的民主，才是唯一办法。那么，在现阶段，确实保证和真正落实人民的表达权利与选举权利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五、文学政治（文人政治）的弊端。托克维尔说，“在法国，政治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分裂状态，分裂为两个不同部分，彼此之间没有往来。一个从事管理，而另一个确立应该构成所有管理基础的抽象原则。一个应常规所需，采取特殊的措施；另一个宣布一般法则，而不考虑运用它们的措施。一个负责公共事务，另一个负责人们的头脑。”文人（哲人）实际上主导着这个国家的思想舆论，引领着民众的政治诉求。文人在指导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时，把文学习惯，比如对于一般抽象理论的爱好的，对于新颖精巧制度的热爱，对于逻辑规则与完整体系的热望，对于完美乌托邦的崇拜，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设计不顾一切代价，甚至乞灵于专制主义手段，都带入到民众的政治思维中去。但是，“在一个作家身上值得称赞的东西在一个政治家身上有时是缺陷，常常导致伟大文学的同样品质也会引起伟大革命。”最后所导致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基础工作是被这个民族中最为文明的阶级（即文人）所奠定的，并且是被最粗野和最没有教养的阶级（大众）所执行的，”这样，“理论上的温和和行为上的暴力之间的这种反差，作为法国大革命最为奇怪的特征之一”。理论和实践之间不能等同，学者不能代替政治家。政治需要学者与政治家的合作，但学者不能扮演政治家的角色。就现代社会而言，学者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具有学者风格，往往会给政治生活带来灾难。学者的乌托邦政治理想往往在现实中演变为极权主义版本。比如，具有浓厚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希望在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导致理想完全脱离中国社会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目的就是摆

脱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论，切切实实地为广大人民为社会政治进步做些实事。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两种现代政治伦理，即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文人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乌托邦和美好愿望，会不急一切后果，采取任何手段，在他们的实践中往往体现为意图伦理；而在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中，采取任何政策，都要考虑其后果与影响，却常常沦为没有灵魂与理想的政客，是谓责任伦理。而最好的政治伦理是实现两种伦理原则的平衡，也即文人与政客、学者与政治家的合作。

六、庞大首都的成因及其政治效应。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下的巴黎由于政治精英、工业人口和生产资源的集中，几乎代表着法国，或者成为法国自身；首都的一举一动决定了整个国家，整个国家的治乱系于巴黎；而这种首都一支独大的原因在于中央集权制所造成的首都资源集中。联想到中国，由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权力集中体制，造成了首都北京城区的蔓延，人口的膨胀，功能的繁多。这样既不利于国家的政治安全，也不利于首都的社会管理，还造成了资源的过分与不平等集中。所以，当代才不断地有迁都的说法，最近又有副都之说与转移非首都功能的措施。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耗费极大心血完成的跨越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名著，其精髓随处可见，对其可作多种解读。

译者

2018年7月

乔恩·埃尔斯特

《旧制度与大革命》(AR)是已有最优秀和最知名的历史著作之一。但是,一些人提出的异议是,它并不真正属于历史体裁,因为它不包含叙事。在这部作品的开首句子中,托克维尔本人声明:“本书并非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历史。它已经被人用辉煌的华章描绘过,所以我不愿再这样做。该书毋宁是对大革命的一种研究。”他在前言中解释,他准备写下第二卷,该卷包括对大革命本身的叙述。他有关这一卷的草稿相当有趣,我会在后文中稍稍提及。

可能的反对意见之所以得以坚持,只是因为人们对于历史著作有一种不必要的纯粹概念。20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常常把长时段史(histoire de la longue durée)同编年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加以比较,把对于制度与文化变迁的长期研究同对于行为与事件的短期叙事加以比较。《旧制度与大革命》无疑跨越了一个长期时段,从15世纪的查理七世到大革命即将爆发前的年代。比如,托克维尔表明了一个足智多谋的高尚阶级(nobility)如何慢慢演变为一个无能为力的贵族阶级(aristocracy),城市如何渐渐地失去其独立,直到仅仅剩下一副空洞的躯壳。

^{*} 本《导论》中的罗马数字边码和正文中的阿拉伯数字边码均为本书翻译所依据的英文剑桥版页码。——译者

《旧制度与大革命》除了是一种长时段研究，也可以作为一部**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著作和**社会科学**著作来阅读。由于措辞“结构分析”有许多理解方式，我需要解释我是如何使用它的。请想象一座纸牌做成的房子，偶尔会受到风的光顾。尽管人们不能说，何时一阵风强大到足以让这个结构坍塌，也不能说，哪一张纸牌会最先倒下，但是，人们不是合理地怀疑，而是可以带着“确实可靠性”（moral certainty）说，房子会倒塌。同样，据说，2007年的次贷危机是“一场坐等发生的事故”。我们也可以根据同样的线索理解最后一章的标题“大革命如何自然地从前的事务中出现”。我会解释，托克维尔认为，君主专制制度实际上成为一座纸牌造就的房子。其倒塌的确切引发者是偶然的，但是，到了（比方说）1750年，某一触发革命的事件的发生具有确实可靠性。

在一封写于1894年致W. 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天真地写道：“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nötig）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恺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托克维尔没有使用这种带有必然性的目的论形式。如果他在德国写作，他会说，引发大革命的某一事件的发生与其说是**必要的**（notwendig）不如说是**需要的**（nötig）——在因果上与其说是必需的不如说是需要的。然而，他打算继续下去，在第二卷中，研究特殊的触发事件。

就像任何历史著作一样，《旧制度与大革命》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是否**成功**了。在一些特定的事实性问题上，他没有成功。吉尔伯特·夏皮罗和约翰·马尔科夫（Gilbert Shapiro and John Markoff）在《大革命的要求：对于1789年陈情表的内容分析》（*Revolutionary Demands: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Cahiers de Doléance of 1789*）中表明，托克维尔对于三个等级在大革命前夜所准备的陈情表做出了许多没有根据的归纳。在弗朗索瓦·菲雷的《阐释法国大革命》中，他发现，在托克维尔对1750年之前时期的处理上存在许多错误与遗漏，但是他支持著名的“托克维尔效应”（Tocqueville effect）（参见后面的段落），它和大革命之前最近的时期有关。他看到，托克维尔只是对最近的过去而不是遥远的